

政府评奖:激励还是扭曲? ——基于中国企业—劳动力匹配调查的实证研究

罗连发,王昇唯

(武汉大学质量发展战略研究院,湖北 武汉 430072)

摘要: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和要素的合理配置是畅通“国内大循环”的重要抓手,也是我国“十四五”规划的主要目标之一。近年来,不断增长的各类政府评奖活动对企业行为以及资源配置可能产生多维度影响,但鲜有文献对这一问题进行研究。以政府质量奖评选为对象研究政府评奖对企业的效应,并探讨可能的影响机制。基于中国企业—劳动力匹配调查(CEES)数据,实证检验发现获奖对企业的生产率有显著的正效应,这一效应可以被企业信贷条件的改善、生产能力的提升以及创新投入的增加所解释,同时企业家人力资本、政治关系以及其他优惠性政策也对这一效应有显著影响。进一步地检验发现,获奖对企业盈利能力有显著的负效应。因而,政府组织的评奖活动,确实能够帮助企业获得信贷、补贴和创新等方面的更多资源,但其对于生产率的净效应却不显著,对盈利能力有负效应。这表明,评奖可能导致各类资源流向效率更低的企业,从而带来了资源配置扭曲。

关键词:政府评奖;企业效率;中国企业—劳动力匹配调查

中图分类号:F062.9;D6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0566(2022)07-0161-11

Research on Government Awards' Effect: Encouragement or Distortion? An Empirical Study Based on China Employer-Employee Survey

LUO Lianfa, WANG Shengwei

(Institute of Quality Development Strategy, 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72, China)

Abstract: A fair and competitive market environment and the rational allocation of elements are an important starting point for unblocking the “domestic cycle” and one of the main goals of China’s “14th Five-Year Plan”. In recent years, the increasing variety of government awards has an impact on the efficiency of resource allocation, but there is little literature on this issue. This paper takes government quality awards as an example to study the impact of government awards on enterprises and explored possible impact mechanisms. Based on the data from the 2018 China Employer-Employee Survey (CEES), the empirical result of this paper shows that awards have a significant positive effect on the productivity of enterprises. This effect can be explained by the improvement of enterprises credit conditions, the increase in production capacity and innovation input. Entrepreneur human capital, political relations and other preferential policies also have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this effect. Further inspections find that the award has a significant negative effect on the profitability of the enterprise. Therefore, government-organized awards can indeed help

收稿日期:2021-10-28 修回日期:2022-04-21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劳动力错配对制造业企业产品质量影响的实证研究”(16CJL028)。

作者简介:罗连发(1984—),男,江西于都人,武汉大学质量发展战略研究院副教授,经济学博士,研究方向为发展经济学。

enterprises obtain more resources in terms of credit, subsidies, and innovation, but their net effect on productivity is not significant, and it has a negative effect on profitability. This shows that the awards may cause various resources to flow to less efficient companies, thereby causing distortions in resource allocation.

Key words: government awards; productivity; CEES

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议题就是理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1],消除由于政府不当干预而导致的资源错配,进一步提升资源配置的效率。2020年5月中央提出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明确指出需要通过强有力的改革形成高效规范、公平竞争、充分开放的国内统一大市场^[2]。“十四五”规划中,也突出强调要使得“公平竞争制度更加健全”“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取得重大进展”。近年来,我国通过持续深入的改革,在市场体系的建设方面取得了突出成就,政府对市场的干预程度日趋下降。世界银行《2020 营商环境报告》显示,中国政府通过行政审批制度的改革在营商环境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2020年中国营商环境排名上升至世界第31位,较2010年提升了48位。得益于改革措施的有效实施,市场主体的制度性交易成本持续地降低^[3],促进了企业的高质量发展^[4]。经过行政审批改革、商事登记改革等措施,市场主体的准入门槛不断降低,市场主体数量呈现快速增长,2015—2020年市场主体数量年均增速达到了12.56%。政府对市场主体施加的影响,大体可分为两个类型:一是约束性关系,包括市场准入、监管、执法等;二是激励性关系,包括补贴、评奖等。现有文献中,对于减少或规范政府的约束性行为以及政府如何放权等方面关注较多^[5-7],对于补贴这一类激励性行为的研究也十分丰富^[8-10],而对于评奖这样一类激励性行为的研究却较为缺乏。

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现象是,近年来政府的各种约束性干预行为确实在不断减少,但政府举办的各类评奖活动却在不断增长。政府举办的评奖活动会给企业带来复杂的影响:一方面,既有可能产生正外部性,促进企业间的学习,从而带动行业的发展;另一方面,也可能带来负外部性,助长企业的短期化行为,使得部分企业采用一种迎合的策略来参与评奖^[11]。获奖企业不仅未能发挥标

杆示范作用,而且占用了大量由评奖带来的资源,这可能引起新的资源配置扭曲。如果是正向效应占主导,可以认为评奖活动是“有为政府”的重要体现,而如果负向效应占主导,则需要引起我们高度关注,防止政府的“帮助之手”导致新的扭曲。在实践中,政府评奖也引起了越来越多的关切,如原工商总局局长张茅曾在2019年指出“政府应只设‘黑榜’,不设‘红榜’”,认为政府的评奖评优会扭曲市场信号。2018年作为中国质量奖获得者的北京同仁堂被爆出蜂蜜造假行为,市场监管总局随即取消了其中国质量奖称号。这些事件反映出,社会各界对于政府是否应该举办以及如何举办评奖的关注度越来越高。然而,现有文献并没有对以上问题开展有针对性的研究。

在对政府“帮助之手”的研究中,已有文献从多个角度探究了政府补贴对企业的影响,主要集中在政府补贴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上。政府的直接补贴影响企业创新行为的作用体现在两个方面:资源获取和信号传递^[8]。从资源获取角度来看,有文献发现政府补贴是通过影响企业的研发投入进而影响技术创新达到“量变”和“质变”^[12-13]。但由于不同企业之间资源禀赋的差异,政府补贴对其创新绩效的影响也不尽相同^[8],也有学者发现政府补贴对企业创新数量和质量的绩效均较低^[14],过度的政府补贴会对企业自身的研发投入产生挤出效应^[15],也会降低企业的研发强度^[16]。从信号传递的角度来看,获得政府补贴作为一个利好消息传递给企业的利益相关者,可以为企业贴上政府认可的标签,从而帮助企业从利益相关者处获得所需的创新资源^[17-19]。企业获得政府补贴,通常被认为是政府释放出的对企业以及所处行业的认可信号,外部投资者受到这一信号的激励,会进一步地为企业提供更多创新资源以期获得更多的收益。

还有学者研究了政府补贴对企业其他方面的

影响。任曙明等(2014)^[20]研究发现,政府补贴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抵消融资约束对企业生产率的负面效应,进而促进企业生产率平稳持续增长。此外,政府补贴对企业盈利能力也有显著的影响,且这种影响受到行业集中度这一门槛变量的变化具有异质性^[21]。也有学者研究了企业为了获取政府补贴而采取的行为。如赵璨等(2015)^[22]研究发现企业为了获取政府补贴会采取迎合行为,并且这种迎合行为会阻碍政府补贴发挥出应有的作用。

现有文献仍有不少缺憾。一是国外文献在研究方法上主要使用的是随机试验的方法,这一方法在控制环境的同时,也忽视了制度环境本身的重要性。我国的评奖活动发生在经济转型的过程中,不可能忽略中国特定制度环境的影响,特别是企业在奖项申报过程中与政府建立的密切联系。二是国内研究文献则在数据方面样本量较少,且未按随机抽样获取,因而代表性不足。更重要的是,由于关于企业的数据指标较少,已有文献可能存在遗漏重要解释变量的问题,同时也无法挖掘带来评奖效应的可能机制。本文基于一手的企业调查数据,研究政府评奖对于企业生产率和盈利能力的影响,并尝试检验现有学者所提出来的信号效应与补贴效应在中国独特的制度背景下是否存在,以及是否还有除这两个机制以外的其他可能影响机制。本文的研究,对于如何优化政府的评奖行为,并更好地促进政府职能转变,特别是如何处理好政府与企业的关系有一定的启示。

一、制度背景:基于质量奖的介绍

在我国由政府主办的各种面向企业的评奖种类繁多且呈现逐年上升的趋势。由于数据所限,本文主要选择了质量奖作为研究对象。之所以选择这个奖项,一是因为质量奖评选的时间较长,最早于2001年开始评选;二是质量奖评选的范围较广,在全国、省(自治区、直辖市)、地级市、县区一级都层层设立。这表明质量奖在我国的知名度较广且影响力较大,作为研究样本具备一定的代表性。

质量奖在全国层面称为“中国质量奖”,在省(市、区县)一级则称为省长(市长、区长)质量奖。这一名称就代表了质量奖是由政府官方所颁发的奖项,获奖则意味着获得政府的背书。一般而言,各级政府会成立一个工作领导小组全面统筹负责质量奖的评选,并由政府一名主要领导担任组长,同时由多个政府部门作为成员单位。在实际操作中,通常由各地原主管企业质量监管工作的市场监管局(原为质量技术监督局,机构合并以后该职能划入市场监管局)承担具体工作。政府进行质量奖评选的目的,主要是为了表彰那些在卓越绩效管理上成绩较为突出的企业,并在更大范围内推广。

质量奖的评选大致要经过以下几个过程:第一步,是推荐提名。一般是在地方质量主管部门发布质量奖评选办法之后,由各企业进行申报自荐。评选要求企业至少符合3个方面的要求:一是近几年内无违规行为;二是在质量、品牌、创新等方面有突出成就;三是在质量管理体系、管理方法等方面有值得推广的价值。同时,地方主管部门还会增加一些个性化条件,如企业规模、税收贡献、市场份额等。收到申报材料之后,地方主管部门将会对企业进行第一轮筛选,提出推荐名单。第二步,获得推荐资格的企业准备申报材料。这些申报材料是未来考核能否得奖的核心指标,包括政府对产品质量监督检查的结果、质量管理方法、企业盈利能力、技术创新能力、市场占有率等指标。第三步,是专家委员会对企业进行考核。考核主要是对企业提供的材料进行评价,并进行打分排序,得到进入下一轮考核的企业名单。第四步,是对企业进行现场考核。专家委员会将赴候选企业进行现场考察,并由企业人员进行现场答辩。这一轮结束之后,由专家进行投票,提出质量奖获奖的建议名单。第四步,由评审工作领导小组对建议名单进行审批,并发布最终获奖名单,同时举办由政府各个部门参加的颁奖大会,向获奖企业授奖牌与发放奖金。值得注意的是,企业如果想要获奖,必须获得地方质量主管部门的推荐,而想要获得更高一级的质量奖,也必须经由

地方政府或行业协会的推荐。这种层层推荐的模式,使得企业和地方政府在评奖过程中能够加深了解,进而建立联系。

从以上评奖过程可以看到,质量奖具有很强的官方背景,这与国外大多由第三方机构组织的评奖有很大差别,这就导致评奖对企业的影响也会存在一定的差异。评奖对企业可能的影响包括:第一,补贴效应,即政府发放给企业的奖金;第二,信号效应,即政府对企业质量管理能力的“背书”,特别是政府将以推广质量管理经验的方式,提升企业的知名度;第三,政治关联效应,评奖的过程中参评企业需要与政府进行密切接触,向基层政府展示自身能力与潜力以获得推荐名额,基层的政府也可以将辖区内企业获奖作为向上一级证明自身工作成果的一种体现,因此基层政府与评奖企业之间实际上存在共同利益关系。

二、研究设计

(一) 数据来源

本文研究的数据来自于由武汉大学、斯坦福大学、香港科技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等单位共同完成的中国企业—劳动力匹配调查(China Employer-Employee Survey, CEES) 2018 年度数据。CEES 严格基于随机分层抽样的原则,在调查省内随机抽取不同规模和不同类型的制造业企业样本,并有严格的数据校验和质量把控流程,数据质量得到了诸多专家学者的认可。2018 年度 CEES 在广东、湖北、江苏、吉林、四川等 5 个省份开展,成功获取了 1978 家制造业企业的有效调查数据,包含企业注册类型、财务状况、创新状况、劳动力状况、设备使用状况、企业家状况等 500 余项指标,在随年份变化的指标中(如企业人数、财务绩效等),调查覆盖了 2015—2017 年的数据。同时,这一数据还详细地调查了企业的获奖情况,包括是否获得质量奖、首次获奖的年份等。这就能在控制企业其他特征的情况下观测到评奖对于企业生产率的可能影响,而多维度的数据为进一步探究可能的影响机制提供了可能。本文所使用的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值如表 1 所示。

表 1 主要变量定义和描述性统计值

变量名	观测值	平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获奖(0 = 未获奖;1 = 获奖)	5454	0.29	0.45	0.00	1.00
劳动生产率/万元/人	5454	78.27	162.80	0.75	1666.67
TFP	5454	-0.01	1.59	-7.51	11.89
ROA	5454	0.07	0.22	-0.35	1.93
ROE	5400	0.10	0.24	-0.40	0.81
企业年龄	5454	13.55	8.90	0.00	81.00
出口(0 = 无出口;1 = 有出口)	5454	0.37	0.48	0.00	1.00
授信(0 = 无授信;1 = 有授信)	5331	0.38	0.48	0.00	1.00
信用评级(0 = 无评级;1 = 有评级)	5325	0.45	0.50	0.00	1.00
使用自动化生产线工人比例	4376	0.21	0.35	0.00	1.00
使用机器人(0 = 无;1 = 有)	5266	0.16	0.36	0.00	1.00
研发部门(0 = 无;1 = 有)	5433	0.50	0.50	0.00	1.00
专利申请(0 = 无;1 = 有)	5436	0.40	0.49	0.00	1.00
企业家受教育年限	5420	14.05	3.39	0.00	22.00
政治关联(0 = 无;1 = 有)	5406	0.24	0.42	0.00	1.00
国家级开发区(0 = 否;1 = 是)	5373	0.14	0.35	0.00	1.00
省级开发区(0 = 否;1 = 是)	5373	0.12	0.32	0.00	1.00
其他开发区(0 = 否;1 = 是)	5373	0.09	0.28	0.00	1.00
补贴(0 = 无;1 = 有)	5454	0.29	0.46	0.00	1.00
高新技术企业(0 = 否;1 = 是)	5439	0.24	0.43	0.00	1.00

(二) 获奖企业的分布

本文将企业获得过质量奖定义为“获奖”。图 1 给出了获奖企业与非获奖企业在地域分布上的特征。可以看到,获奖企业中分布于广东省的比例明显偏低,仅为 14%,另外 4 个省份则在 20% 及以上。未获奖企业中,广东、江苏等东部省份明显偏高,而湖北、吉林、四川等中西部省份则明显偏低,这可能是由于质量奖均设有一定的名额和比例限制,广东、江苏等地由于经济发展程度较高,制造业企业较为集中^[23],较多的企业数量稀释了获奖企业的占比。这一数据表明企业所在地区可能是影响企业获奖的一个重要因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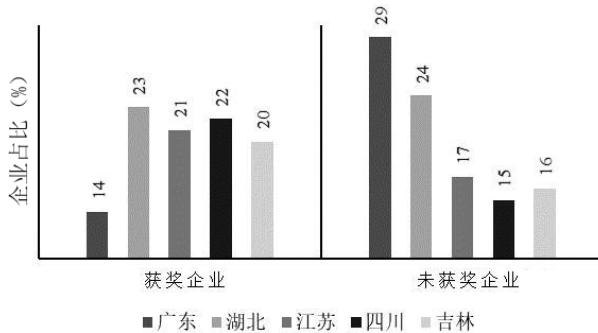


图 1 获奖企业与未获奖企业的省份分布

图2 获奖企业成立年份分布图表明,获奖企业的占比随时间变化呈现增长趋势。一方面,可能是由于我国企业的平均存续时间为6.67年^[24],在2018年进行调查时早年间的获奖企业已经注销。另一方面,与近年来政府不断上升的激励性政策有关。从行业分布上来看,获奖企业主要集中在通用设备制造(10%)、非金属产品制造(10%)、电子产品制造(9%)、食品加工(7%)以及专用设备制造(7%),以上5个产业占到了45%,未获奖企业中以上5个行业的占比为35%,这一结果初步说明了获奖企业与未获奖企业无明显的行业性集中度差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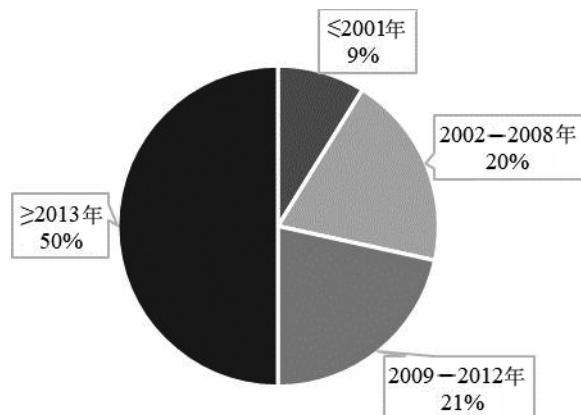


图2 获奖企业成立年份分布

(三) 获奖与企业生产率及盈利指标的描述性统计

表2给出了获奖企业与未获奖企业在生产率、盈利水平和企业特征上的差异,均值的t检验结果表明这些差异十分显著。获奖企业的平均劳动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均高于未获奖企业,但是获奖企业在盈利能力方面相较于未获奖企业更差。这表明,评奖有可能给企业带来更多的资本投入,而人均资本存量的增加对生产率的提升有非常重要的作用^[25]。在企业特征方面,获奖企业的平均年龄较未获奖企业高出27%,获奖企业中出口企业占比相较于未获奖企业高出8个百分点,且相关文献也证实了企业年龄和出口情况对企业生产率和经营绩效有一定的影响^[26-28],因此需要对企业年龄和出口情况加以控制。

表2 获奖企业与未获奖企业在生产率、盈利水平与个体特征的差异

类型	获奖 (=0)		获奖 (=1)		差异
	Mean	Obs.	Mean	Obs.	
1. 生产率和盈利水平					
劳动生产率	69.47	4092	101.55	1623	-32.08 ***
TFP	-0.17	3975	0.43	1583	-0.59 ***
ROA	0.08	4113	0.05	1635	0.02 ***
ROE	0.10	4074	0.09	1611	0.01 *
2. 其他企业特征					
企业年龄	12.34	4143	16.49	1665	-4.14 ***
出口	0.35	4110	0.43	1656	-0.08 ***

注: *、*** 分别代表 t 检验值在 $p < 0.10$ 、 $p < 0.01$ 的差异性显著。

(四) 计量模型设定

根据以上描述性统计分析,本文的回归模型设定如下:

$$\text{Efficiency}_{ijdt} = \beta_0 + \beta_1 \text{Award}_{ijdt} + Z_{ijdt}\gamma + \gamma_j + \gamma_d + \gamma_t + \varepsilon_{ijdt} \quad (1)$$

其中,下标 i, j, d, t 分别代表企业、行业、城市和年份(2015年,2016年,2017年)。被解释变量 Efficiency_{ijdt} 代表企业的效率指标,参考相关文献的做法^[29-30],具体为:劳动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TFP),其中劳动生产率指标由企业年度销售收入/年末员工总人数计算得到,TFP指标参照 Cheng 等(2021)^[31]和高娟(2018)^[32]对 Cees 数据的处理思路,采用固定效应模型所估计的对数线性 C-D 生产函数的残差项作为代理指标,其他指标均源自于企业实际填报数据。 Award_{ijdt} 是模型的核心解释变量, Award_{ijdt} 等于 1 代表企业得过奖, Award_{ijdt} 等于 0 代表企业没有得过奖。 Z_{ijdt} 代表的是既与解释变量相关又与被解释变量相关的其他解释变量,基于前文的样本描述性统计结果,包括企业的年龄与是否出口。 γ_j 代表行业虚拟变量, γ_d 代表城市虚拟变量, γ_t 代表年份虚拟变量, ε_{ijdt} 是随机误差项。本文研究的主要问题是,通过实证检验 Award_{ijdt} 的估计参数 β_1 是否显著,并进一步探究影响 β_1 可能的机制。

三、实证检验

(一) 基准回归结果

表3给出了获奖对企业生产率影响的 OLS 回归结果。仅控制地区和行业虚拟变量时,获奖对于劳动生产率有显著正效应(列1),获奖企业的劳动生产率较未获奖企业高出40%。进一步控制

年份以及企业年龄和出口变量以后,获奖对于劳动生产率的回归系数仍然是显著为正,且系数变化不大(列 2 和列 3)。将被解释变量换为 TFP 以后,我们可以得到类似的结果,即不论是否加入控制变量,获奖对 TFP 的回归系数在 1% 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为正(列 4—列 6)。表 3 的回归结果表明获奖无论是对企业的劳动生产率还是全要素生产率都有显著的正向效应。

表 3 获奖对企业劳动生产率与 TFP 影响回归

类型	劳动生产率(对数)			TFP		
	(1)	(2)	(3)	(4)	(5)	(6)
获奖	0.402 *** (0.036)	0.403 *** (0.036)	0.360 *** (0.038)	0.669 *** (0.050)	0.671 *** (0.050)	0.507 *** (0.049)
企业年龄			0.003 (0.002)			0.018 *** (0.002)
出口				0.193 *** (0.037)		0.561 *** (0.049)
年份固定效应	No	Yes	Yes	No	Yes	Yes
行业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城市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N	5454	5454	5454	5454	5454	5454
R ²	0.147	0.151	0.156	0.130	0.133	0.164

注: 括号内为标准误。*** 代表在 $p < 0.01$ 水平下差异显著。

(二) 可能的机制分析

基于文献以及我国质量奖的评选过程分析,获奖影响企业生产率的可能机制包括:①获奖会影响企业获得信贷资源的可能性,因为获奖可作为企业经营质量的一个外在信号,从而给投资人带来更多的信任信息^[33],进而为企业带来更多的资本投入;②通过评奖过程的分析可以看到,获奖企业能够向政府证明其在各方面的条件更优越,从而也可能使得企业拥有更多来自政府的支持,进而提高企业的生产能力,如使用更先进的机器设备等;③评奖还有可能影响企业的创新投入和创新能力,其原因在于获奖企业可以拿到一些直接的现金补助,同时由于质量奖是由政府多个部门参与且由地方政府的重要官员颁授,其也可能帮助企业获得其他部门(如经信委、发展改革委等)的创新补贴,企业在申报奖项时和获奖后会与地方政府建立较为密切的联系,Faccio 等(2006)^[34]的研究发现与政府关系越紧密的企业获得的政府补贴越多。

本文用企业是否获得授信、是否获得过信用

评级作为信贷条件的代理变量,用自动化生产线工人占比与是否使用机器人作为生产能力的代理变量,用是否设立研发部门和是否申请专利作为创新能力的代理变量。表 4 在控制企业特征、时间固定效应、行业固定效应和城市固定效应以后进行 OLS 回归,检验获奖对于这些变量的效应是否显著。结果表明,获奖对于以上 6 个变量的系数均在 1% 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

表 4 获奖对企业信贷条件、生产能力与创新能力的效应

类型	有授信	有信用评级	自动化生		使用	有研发	有申请
			产线占比	机器人			
变量	(1)	(2)	(3)	(4)	(5)	(6)	
获奖	0.135 *** (0.017)	0.212 *** (0.017)	0.050 *** (0.013)	0.069 *** (0.013)	0.280 *** (0.016)	0.347 *** (0.016)	
企业年龄	0.003 *** (0.001)	0.004 *** (0.001)	-0.001 ** (0.001)	-0.001 (0.001)	0.004 *** (0.001)	0.003 *** (0.001)	
出口	0.158 *** (0.017)	0.163 *** (0.017)	0.009 (0.013)	0.092 *** (0.013)	0.216 *** (0.013)	0.121 *** (0.016)	
年份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行业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城市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N	4260	4260	4260	4260	4260	4260	4260
R ²	0.209	0.234	0.102	0.211	0.271	0.284	

注: 括号内为标准误。**、*** 分别代表在 $p < 0.05$ 、 $p < 0.01$ 水平下差异显著。

接下来,将这些变量加入到回归方程,以检验这些变量能否解释以及能够在多大程度上解释获奖对生产率的效应。对劳动生产率的回归结果显示(见表 5),在方程加入信贷条件变量以后,获奖变量的参数估计值在 1% 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见表 5 的列 2),其大小较基准回归下降了 28%(从 0.315 下降为 0.228)。将生产能力变量加入到回归方程以后,获奖变量的参数估计值仍然显著为正(见表 5 的列 3),其大小较基准回归下降了 13%(从 0.315 下降为 0.273)。将创新能力变量加入到回归方程以后,获奖变量的参数估计值也仍然显著为正(表 5 的列 4),但其大小较基准回归有较大幅度的下降,下降了 45%(从 0.315 下降为 0.174)。同时控制信贷条件、生产和创新能力以后,获奖变量的参数估计值仍然在 1% 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但其大小下降了 65%。这一回归结果表明,获奖对企业劳动生产率有显著的正效应,但其有很大一部分效应可以被获奖企业更好的借贷条件、生产能力以及创新能力所解释。

表5 获奖对劳动生产率的回归

类型	被解释变量：劳动生产率(对数)				
	(1)	(2)	(3)	(4)	(5)
获奖	0.315 *** (0.042)	0.228 *** (0.042)	0.273 *** (0.041)	0.174 *** (0.044)	0.110 ** (0.044)
信贷条件	No	Yes	No	No	Yes
生产能力	No	No	Yes	No	Yes
创新能力	No	No	No	Yes	Yes
其他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Yes
年份、行业及城市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N	4142	4142	4142	4142	4142
R ²	0.176	0.201	0.194	0.192	0.224

注：括号内为标准误。**、*** 分别代表在 $p < 0.05$ 、 $p < 0.01$ 水平下差异显著。

将被解释变量换为 TFP 后的回归结果如表 6 所示。在分别控制信贷条件、生产和创新能力变量以后，获奖变量对于全要素生产率的参数估计值都继续保持了显著为正，估计值的大小较基准回归均有一定幅度下降，分别下降了 22%、14% 和 46%。当这些变量同时控制时，获奖变量的参数估计值仍然在 1% 的显著性水平上为正，估计值的大小则下降了 63%（从 0.451 下降为 0.168）。表 6 的回归结果表明，获奖企业与未获奖企业在 TFP 上的差异，有很大一部分可以被信贷条件、生产能力与创新能力所解释。这也验证了获奖对于企业存在着改善信贷的作用。

表6 获奖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回归

类型	被解释变量：TFP				
	(1)	(2)	(3)	(4)	(5)
获奖	0.451 *** (0.054)	0.354 *** (0.055)	0.389 *** (0.054)	0.245 *** (0.058)	0.168 *** (0.058)
信贷条件	No	Yes	No	No	Yes
生产能力	No	No	Yes	No	Yes
创新能力	No	No	No	Yes	Yes
其他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Yes
年份、行业及城市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N	4142	4142	4142	4142	4142
R ²	0.181	0.196	0.204	0.201	0.227

注：括号内为标准误。*** 代表在 $p < 0.01$ 水平下差异显著。

（三）控制更多的解释变量

为了消除遗漏解释变量对估计的影响，我们在回归中进一步地控制更多的解释变量。进一步控制的变量包括：①企业家相关变量，具体为企业家受教育年限、行业工作年限以及企业家是否有政治关联，其中政治关联使用的是企业家是否为

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的 0 – 1 变量作为代理变量^[35]。企业家的人力资本与政治关联，对于获知评奖的相关信息以及更好地与政府沟通都可能产生正向作用。②其他的政策变量，具体包括了企业是否在开发区、是否获得过政府补贴以及企业是否具有高新技术企业称号。有文献认为，开发区具有集聚效应与选择效应，可以吸收大量的外商投资、吸纳大量就业人口^[36]，从而使得处在开发区的企业具有生产率优势^[37]；补贴对于生产率也将产生多维度效应^[38]；高新技术企业由于具备在财政激励和税收优惠上的政策，在产出增长上也更具有优势^[39]，并有更高的全要素生产率^[40]。

表 7 给出了进一步控制以上变量以后对劳动生产率的回归结果。在控制年份、城市、行业等变量并加入企业家相关变量以后，获奖变量的参数估计值仍然为正，并在 1% 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估计值大小与基准回归相比下降不大（见表 7 的列 2）。进一步控制开发区和补贴变量以后，参数估计值依旧在 1% 显著性水平下显著，估计值的大小下降了 21%（从 0.263 下降为 0.209）；控制高新技术企业变量以后，获奖变量仍然显著，但系数大小下降了 48%。在同时控制以上变量以及信贷条件、企业生产能力、创新能力等企业特征变量以后，获奖对于劳动生产率的参数估计值为正，但不显著了。

表7 获奖对劳动生产率的回归(控制更多的变量)

类型	被解释变量：劳动生产率(对数)				
	(1)	(2)	(3)	(4)	(5)
获奖	0.263 *** (0.044)	0.250 *** (0.043)	0.209 *** (0.044)	0.137 *** (0.045)	0.064 (0.045)
有补贴			0.250 *** (0.041)	0.195 *** (0.041)	0.137 *** (0.042)
高新技术企业				0.352 *** (0.046)	0.246 *** (0.049)
企业家变量	Yes	Yes	Yes	Yes	Yes
开发区变量	No	Yes	Yes	Yes	Yes
其他控制变量	No	No	No	No	Yes
年份、行业及城市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N	4001	4001	4001	4001	4001
R ²	0.189	0.203	0.210	0.220	0.245

注：括号内为标准误。*** 代表在 $p < 0.01$ 水平下差异显著。

表 8 将被解释变量更换为 TFP ，我们可以得到类似的结果。加入企业家个人特征以及其他政策

变量以后,获奖对 TFP 的效应仍然是显著的,但参数估计值有较大幅度下降(50%)。而进一步控制信贷条件、企业生产能力、创新能力等企业特征变量以后,获奖的效应就得不显著了。表 7 和表 8 的回归结果表明,获奖对于企业生产率的正效应,一部分可被企业特征所解释,另一部分可被其他相关的政策效应所解释。

表 8 获奖对 TFP 的回归(控制更多的变量)

类型	被解释变量:TFP				
	(1)	(2)	(3)	(4)	(5)
获奖	0.335 *** (0.056)	0.319 *** (0.056)	0.271 *** (0.057)	0.167 *** (0.058)	0.063 (0.060)
有补贴			0.292 *** (0.057)	0.213 *** (0.058)	0.126 ** (0.057)
高新技术企业				0.510 *** (0.069)	0.369 *** (0.070)
企业家变量	Yes	Yes	Yes	Yes	Yes
开发区变量	No	Yes	Yes	Yes	Yes
其他控制变量	No	No	No	No	Yes
年份、行业及城市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N	4001	4001	4001	4001	4001
R ²	0.203	0.215	0.220	0.232	0.253

注:括号内为标准误。**、*** 分别代表在 $p < 0.05$ 、 $p < 0.01$ 水平下差异显著。

(四) 获奖的时间效应

为了进一步探究获奖这一事件对于企业生产率产生的效应是短期效应还是长期效应,我们构建了企业获奖的时间变量,得到不同获奖时长对生产率的效应。回归模型如下:

$$\text{Efficiency}_{ijdt} = \beta_0 + \beta_1 t_0 + \beta_2 t_1 + \beta_3 t_2 + \beta_4 t_3 + Z_{ijdt} \gamma + \gamma_j + \gamma_d + \gamma_t + \varepsilon_{ijdt} \quad (2)$$

其中, t_0, t_1, t_2, t_3 为虚拟变量, $t_0 = 1$ 代表企业在当年获奖, $t_1 = 1$ 代表企业已获奖 1~3 年, $t_2 = 1$ 代表企业已获奖 4~10 年, $t_3 = 1$ 代表企业已获奖 10 年以上, 参照组为未获奖企业。表 9 给出了获奖时间效应的回归结果,列 1 和列 3 的结果显示,在未控制企业特征变量时,4 个获奖变量对于劳动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的效应在 1% 的显著性水平下为正。同时我们发现被解释变量为劳动生产率时 t_2 的参数估计值最高,也就是说获奖对企业劳动生产率的效应呈现一个先增长后下降的倒“U”型曲线,在 4~10 年时达到最高,而后会逐渐降低,但仍有正向影响。对 TFP 的回归结果(列 3 和列 4)则表明,获奖时间越长效应越大。这一结

果说明,获奖对于企业生产率的影响具有长期效应。同时,也说明了早期的评奖对于企业的生产率效应更大一些。

表 9 获奖时间对劳动生产率与 TFP 的回归

类型	劳动生产率对数		TFP	
	(1)	(2)	(3)	(4)
t_0	0.206 ** (0.088)	0.186 ** (0.087)	0.472 *** (0.132)	0.396 *** (0.129)
t_1	0.331 *** (0.061)	0.302 *** (0.061)	0.541 *** (0.084)	0.423 *** (0.083)
t_2	0.534 *** (0.055)	0.488 *** (0.056)	0.655 *** (0.073)	0.456 *** (0.073)
t_3	0.418 *** (0.072)	0.368 *** (0.075)	0.883 *** (0.111)	0.615 *** (0.113)
控制变量	No	Yes	No	Yes
年份、行业及城市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N	5364	5364	5364	5364
R ²	0.150	0.154	0.130	0.162

注:括号内为标准误。**、*** 分别代表在 $p < 0.05$ 、 $p < 0.01$ 水平下差异显著。

(五) 获奖对企业盈利能力的影响

除了企业的生产率以外,我们还非常关注企业的盈利能力,因为这反映了企业资本配置的水平,并且在政府补贴的相关研究中,有学者基于上市公司数据研究证明了企业盈利能力和政府补贴金额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41]。在描述性统计中,发现获奖企业的盈利水平显著低于未获奖企业。进一步地,在回归方程(1) 中,将被解释变量更换为企业的 ROA 与 ROE 进行回归。结果表明在控制一些基础的变量以后,获奖对企业的 ROA 与 ROE 的效应是显著为负的(见表 10),其中获奖降低了 ROA 2.2%(见表 10 的列 3),降低 ROE 1.2%(见表 10 的列 6)。

表 10 获奖对企业盈利的回归

类型	ROA			ROE		
	(1)	(2)	(3)	(4)	(5)	(6)
获奖	-0.022 *** (0.006)	-0.022 *** (0.006)	-0.022 *** (0.006)	-0.016 ** (0.007)	-0.016 ** (0.007)	-0.012 * (0.007)
控制变量	No	No	Yes	No	No	Yes
年份固定效应	No	Yes	Yes	No	Yes	Yes
行业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城市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N	5565	5565	5565	5565	5565	5565
R ²	0.086	0.087	0.088	0.051	0.053	0.054

注:括号内为标准误。*、**、*** 分别代表在 $p < 0.10$ 、 $p < 0.05$ 、 $p < 0.01$ 水平下差异显著。

表 11 进一步控制了获奖的三个影响机制变量(信贷条件、生产能力和创新能力)之后,获奖对

于 ROA 的效应依然是显著为负的(见表 11 的列 5), 对 ROE 的效应为负, 但不显著。

表 11 获奖对 ROA 的回归(控制更多变量)

类型	被解释变量: ROA				
	(1)	(2)	(3)	(4)	(5)
获奖	-0.017 *** (0.007)	-0.019 *** (0.007)	-0.017 *** (0.007)	-0.020 *** (0.007)	-0.021 *** (0.007)
信贷条件	No	Yes	No	No	Yes
生产能力	No	No	Yes	No	Yes
创新能力	No	No	No	Yes	Yes
其他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Yes
年份、行业及城市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N	4206	4206	4206	4206	4206
R^2	0.096	0.097	0.096	0.097	0.097

注: 括号内为标准误。*** 代表在 $p < 0.01$ 水平下差异显著。

进一步地考察获奖对于盈利能力的时间效应, 我们在方程中加入 t_0, t_1, t_2, t_3 , 可以得到表 12 的回归结果。在对 ROA 的回归中, t_0, t_1, t_2 均显著为负, 但估计值大小随时间而递减, t_3 的参数估计值为负, 但不显著, 控制企业特征变量以后结果没有太大变化(见表 12 的列 2 和列 4)。在 ROE 的回归中, t_0, t_1, t_2, t_3 的估计值均为负, 但仅有 t_0 的参数估计值是显著的。这一回归结果表明, 从政策效果的时序来看, 获奖在短期内对于企业盈利能力的影响最大, 而后这一影响逐渐降低。

表 12 获奖时间对企业盈利能力的回归

类型	ROA		ROE	
	(1)	(2)	(3)	(4)
t_0	-0.039 *** (0.010)	-0.039 *** (0.010)	-0.039 ** (0.016)	-0.037 ** (0.016)
t_1	-0.027 *** (0.009)	-0.027 *** (0.009)	-0.018 (0.012)	-0.016 (0.012)
t_2	-0.018 ** (0.008)	-0.017 ** (0.008)	-0.020 * (0.011)	-0.015 (0.011)
t_3	-0.016 (0.011)	-0.016 (0.012)	-0.007 (0.015)	0.003 (0.016)
控制变量	No	Yes	No	Yes
年份、行业及城市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N	5472	5472	5472	5472
R^2	0.087	0.088	0.053	0.054

注: 括号内为标准误。*、**、*** 分别代表在 $p < 0.10$ 、 $p < 0.05$ 、 $p < 0.01$ 水平下差异显著。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研究发现, 获奖的企业表现出更高的生产率。不过, 获奖企业更高的生产率, 有相当一部分可以被获奖后企业信贷条件的改善、生产能力的提升以及创新投入的增加等 3 个渠道所解释。进一步控制企业家人力资本、政治关系以及其他优惠性

政策等变量以后, 获奖对于企业生产率的效应变得不显著。基于获奖时间的回归分析发现, 获奖时间越长对生产率的作用越大, 说明获奖对于企业生产效率的提升有长期影响。此外, 政府评奖对于企业的资产回报率具有显著负效应, 在同样控制更多可能的遗漏变量以后, 这一显著的负效应仍然存在,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 负效应逐渐减弱。这意味着, 政府直接参与评奖可能导致资源配置的扭曲, 即使得获奖企业以更低的成本获得资本, 并进而降低盈利能力。获奖对于生产率与资本回报率效应之间的反差, 实际上可以从获奖影响生产率的机制得到部分解释, 即获奖企业更有可能获得贷款以及创新投入, 同时获奖企业本身拥有着更多政治关联与其他类型政策优惠。

本文的研究对于“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进一步深化改革、转变政府职能有重要的政策启示。第一, 清理不必要的政府评奖活动, 控制新的政府评奖项目设立。与行政审批不同, 政府没有给企业贴“红榜”的法定职责, 政府的评奖评优活动的设立缺乏相应的法律或制度规范, 这也是近年来评奖数量大规模增长的主要原因。应参考“负面清单”管理的理念对评奖活动加以规范, 凡是法律没有规定的, 都不能设立评奖, 将“红榜”交由市场主体去评价, 真正做到“让市场的归市场, 让政府的归政府”。第二, 将政府评奖主要转向由社会第三方来举办, 政府主要履行监管职能, 防止评奖成为政府部门设租、企业寻租的手段。如美国波多里奇质量奖评选过程中, 会对企业的管理问题进行诊断并有针对性地提出改进建议, 有力地促进了卓越绩效方法的实施, 进而提高了企业整体的经营效益。但如果由政府来举办评奖, 并将其与其他的奖励、补贴捆绑在一起, 则容易引发企业的迎合行为, 使得评奖难以达到其设立的初衷。为此, 建议参考美国、欧洲、日本等国家和地区质量奖设立的模式, 将大部分面向企业的评奖交由行业协会等第三方组织来评选, 政府提供奖金支持, 同时对评选的公正性进行监管。第三, 在政府部门绩效评价中不应以企业获得的政府奖作为评价

指标。政府和企业热衷于评奖活动的另一重要原因在于,许多政府考核评价中有关于评奖的指标,这就使得基层政府为了评奖与企业产生合谋行为,难以保证评奖的公平性。为此,要清理各种将辖区内企业获奖作为政府绩效评价指标的做法,着力构建“亲清”型政商关系。

参考文献:

- [1] 刘凤义. 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政府和市场的关系 [J]. 马克思主义研究, 2020(2): 5-15, 163.
- [2] 刘鹤. 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N]. 人民日报, 2020-11-25 (6).
- [3] ZHU X, ZHANG Y. Political mobility and dynamic diffusion of innovation: the spread of municipal pro-business administrative reform in China [J]. Journa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search and theory, 2016, 26(3): 535-551.
- [4] 陈太义, 王燕, 赵晓松. 营商环境、企业信心与企业高质量发展——来自 2018 年中国企业综合调查(CEGS)的经验证据[J]. 宏观质量研究, 2020, 8(2): 110-128.
- [5] 郑烨, 吴建南, 张攀. 简政放权、企业活力与企业创新绩效[J]. 科学学研究, 2017, 35(11): 1737-1749.
- [6] 江轩宇. 政府放权与国有企业创新——基于地方国企金字塔结构视角的研究 [J]. 管理世界, 2016 (9): 120-135.
- [7] 何勤英, 于文超, 秦晓丽. 金字塔层级、政府放权与国有企业代理成本[J]. 当代财经, 2017(8): 69-78.
- [8] 杨洋, 魏江, 罗来军. 谁在利用政府补贴进行创新? ——所有制和要素市场扭曲的联合调节效应 [J]. 管理世界, 2015(1): 75-86, 98, 188.
- [9] 康志勇. 政府补贴促进了企业专利质量提升吗? [J]. 科学学研究, 2018, 36(1): 69-80.
- [10] 毛其淋, 许家云. 政府补贴对企业新产品创新的影响——基于补贴强度“适度区间”的视角 [J]. 中国工业经济, 2015(6): 94-107.
- [11] 罗连发, 王昇唯, 朱芳婧. 政府评奖对企业行为和绩效的影响——基于我国质量奖的多期 DID 检验 [J]. 经济科学, 2021(4): 115-129.
- [12] 杨亭亭, 罗连化, 许伯桐. 政府补贴的技术创新效应:“量变”还是“质变”? [J]. 中国软科学, 2018 (10): 52-61.
- [13] GUO D, GUO Y, JIANG K. Government-subsidized R&D and firm innovation: evidence from China [J]. Research policy, 2016, 45(6): 1129-1144.
- [14] 袁胜军, 俞立平, 钟昌标, 等. 创新政策促进了创新数量还是创新质量? ——以高技术产业为例 [J]. 中国软科学, 2020(3): 32-45.
- [15] YU F, GUO Y, LE-NGUYEN K, et al. The impact of government subsidies and enterprises' R&D investment: a panel data study from renewable energy in China [J]. Energy policy, 2016, 89: 106-113.
- [16] BOEING P. The allocation and effectiveness of China's R&D subsidies-evidence from listed firms [J]. Research policy, 2016, 45(9): 1774-1789.
- [17] KLEER R. Government R&D subsidies as a signal for private investors [J]. Research policy, 2010, 39 (10): 1361-1374.
- [18] FELDMAN M P, KELLEY M R. The ex ante assessment of knowledge spillovers: government R&D policy, economic incentives and private firm behavior [J]. Research policy, 2006, 35(10): 1509-1521.
- [19] LEMER J. The government as venture capitalist: the long-run effects of the SBIR program [J]. Journal of business, 1999, 72: 285-318.
- [20] 任曙明, 吕镯. 融资约束、政府补贴与全要素生产率——来自中国装备制造企业的实证研究 [J]. 管理世界, 2014(11): 10-23, 187.
- [21] 赵凯, 王鸿源. 政府补贴促进了企业盈利能力的提升吗? [J]. 中央财经大学学报, 2019(4): 92-103.
- [22] 赵璨, 王竹泉, 杨德明, 等. 企业迎合行为与政府补贴绩效研究——基于企业不同盈利状况的分析 [J]. 中国工业经济, 2015(7): 130-145.
- [23] 史宇鹏, 和昂达, 陈永伟. 产权保护与企业存续:来自制造业的证据 [J]. 管理世界, 2013 (8): 118-125, 135, 188.
- [24] 王峰, 周南南. 中国企业生命表的编制 [J]. 统计研究, 2009, 26(12): 60-68.
- [25] 吴昊. 中国城市劳动生产率影响因素研究——基于 286 个城市数据面板分析 [J]. 经济经纬, 2017, 34(1): 14-19.
- [26] 周黎安, 张维迎, 顾全林, 等. 企业生产率的代际效应和年龄效应 [J]. 经济学(季刊), 2007(4): 1297-1318.
- [27] 胡晨光, 范晓庆, 张迪. 后危机时代中国沿海发达地区出口强度与企业经营绩效——一个要素密集度差异和研发调节的分析视角 [J]. 江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0, 19(5): 109-118.
- [28] 张坤, 侯维忠, 刘璐. 中国企业存在“出口—生产率悖论”吗? ——基于不同贸易状态的比较分析 [J]. 产业

- 经济研究, 2016(1): 30-39.
- [29] 赵伟, 隋月红. 集聚类型、劳动力市场特征与工资—生产率差异[J]. 经济研究, 2015, 50(6): 33-45, 58.
- [30] 周茂, 陆毅, 陈丽丽. 企业生产率与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进入模式选择——来自中国企业的证据[J]. 管理世界, 2015(11): 70-86.
- [31] CHENG H, LI H, LI T. The performance of state-owned enterprises: new evidence from the China employer-employee survey [J].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 2021, 69(2): 513-540.
- [32] 高娟. 绩效激励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效应——基于“中国企业—劳动力匹配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J]. 中国软科学, 2018(10): 175-183.
- [33] HOWELL S T. Financing innovation: evidence from R&D grants[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17, 107(4): 1136-1164.
- [34] FACCIO M, MASULIS R W, MCCONNELL J J. Political connections and corporate bailouts[J]. The journal of finance, 2006, 61(6): 2597-2635.
- [35] LI H, MENG L, ZHANG J. Why do entrepreneurs enter politics? evidence from China [J]. Economic inquiry, 2006, 44(3): 559-578.
- [36] WANG J. The economic impact of special economic zones: evidence from Chinese municipalities [J].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2013, 101: 133-147.
- [37] 王永进, 张国峰. 开发区生产率优势的来源:集聚效应还是选择效应? [J]. 经济研究, 2016, 51(7): 58-71.
- [38] CHENG H, FAN H, HOSHI T, et al. Do innovation subsidies make Chinese firms more innovative? evidence from the China employer employee survey [R]. NBER Working Paper, No. 25432, 2019.
- [39] 张同斌, 高铁梅. 财税政策激励、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与产业结构调整[J]. 经济研究, 2012, 47(5): 58-70.
- [40] CHONGVILAIVAN A. Learning by exporting and high-tech capital deepening in Singapore manufacturing industries, 1974-2006[J]. Applied economics, 2011, 44: 1-18.
- [41] 张洪辉. 上市公司的财政补贴:“雪中送炭”还是“锦上添花”? [J]. 经济评论, 2015(3): 134-146.

(本文责编:辛 城)